

■对 话

##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 傅逸尘：壮阔的发展历程需要史诗性的作品来呈现

□本报记者 王泓桦

### “新红色经典”提出的依据

记 者：傅老师好，祝贺您以《“新红色经典”论》一书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对您而言，文学评论特别是理论建构的意义是什么？在新时代，文学评论者有何特殊的使命？  
傅逸尘：文学评论、理论建构当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对文学创作而言，其意义有如哲学之于其他学科，或者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的作用不见得那么直接，但读了、深切地体会了，就不同了。换言之，文学评论、理论建构对文学创作是有指导价值与意义的，起码与作家是一种对话或碰撞。“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思潮翻涌，与文学评论、理论建构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是文学评论与理论建构积极推动的结果。

我做文学批评的年头也不短了，但还谈不上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贡献。每个批评家都会努力去寻找和发现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都取得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当代文学却没能跟上这个时代高速发展的步伐，这与文学评论、理论建构的薄弱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无论自身学识，还是批评的能力，都还不足以达到这样高的要求。不过，我会努力，以自己真诚的批评，为新时代文学涌现高峰作品尽绵薄之力。

记 者：从具体的文学评论、文本细读，到关于“新红色经典”的系统阐释，您认为最难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傅逸尘：最困难的应该是寻找能够统领这一体系的内在核心思想，即前面我提到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意义。我一直在想，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包括艺术，之所以思潮迭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现代哲学高度发达，正是这些思想引领和支撑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就相对缺乏这样引领时代精神的哲学潮流，导致即便我们不乏有才华的作家，却少有人能写出具有思想深度、能够表达这个时代精神高度的优秀作品。

我在对“新红色经典”进行分析时，最重要的启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个“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



傅逸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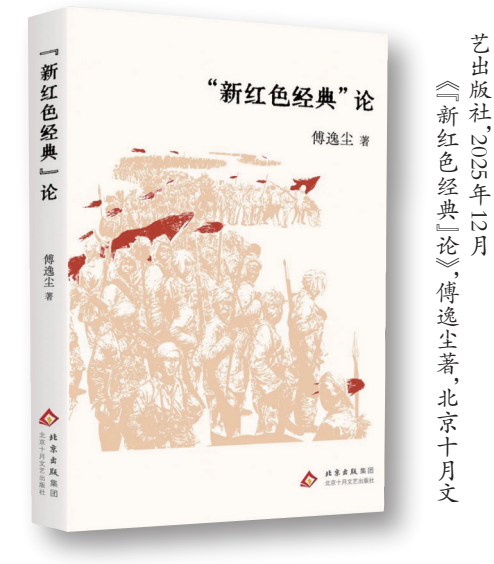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谓之“人民史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习近平总书记进而要求，“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这就是具有统摄力的核心思想与时代精神。我对“新红色经典”的分析，就是据此展开的。

### 何为“人民史诗的文学”

记 者：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真正被纳入“人民史诗的文学”的范畴？  
傅逸尘：首先是对“人民史诗”的认识与理解。“人民史诗”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历史，也包括当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提炼中国经验、阐释中国精神、传播中国话语。

“人民史诗的文学”包含三个本质性元素：一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史诗性”，包括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两个阶段；二是以“史诗”的文学形式与艺术品格来书写这百年历史；三是要写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所内蕴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如此长河般的历史与现实应该也必然具有人民性与史诗性，召唤着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竞相涌流。

“人民史诗的文学”在近年来涵盖了两个较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一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反映城乡变化的现实题材作品持续涌现；二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井喷之势。前者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下延续与未来想象，后者



艺出版社，2025年12月《新红色经典》论》，傅逸尘著，北京十月文

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现实书写的前提或来路。这两种现象实乃一条线段之两端，共同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艰苦奋斗、勇毅前行的历史进程。它们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学形式上，都在向着“人民史诗”的思想高度、宏阔格局、艺术形式勉力探索，值得持续关注、批评和研究。由此，“新红色经典”的崭新历史亦得以建构成型。

记 者：“史诗性”并非新时代的新概念，早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进行评价时就被广泛使用。当年用于评价“红色经典”的“史诗性”标准，是否完全切合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创作实际？二者语境不同，“史诗性”的

##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 张二棍：新意，即我的诗意来源

□张昊月

### 书写寻常百姓的烟火缭绕

张昊月：祝贺张老师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部诗集是您近年诗歌作品的选集，里面有多首诗作流传甚广，不少诗歌爱好者借助公众号等推荐您的作品。在您看来，您诗歌中的哪些特质可能是赢得读者喜爱的原因？

张二棍：感谢您。我始终觉得，我们需要文学里一个别样或极致的世界，以此来照拂、慰藉、鼓舞现实中那一个越来越近乎工具与器皿的自己。说到我自己的诗歌，也无外乎是一句句写给自己的告诫或承诺、反驳或劝慰……我从来算不上完美意义上的诗人，更无力成为一个在修路里躬耕、于哲思中跌宕的洞察者和沉潜者。我把写作诉求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日常中，我渴望用更朴实的腔调，去书写寻常百姓的烟火缭绕和生生不息。我觉得，许多读者能够喜欢，可能就源于我写的也正是他们的火热生活吧。当然，被大众媒体传播的作品也有诸多我不满意，甚至不时有“悔其少作”的冲动。我需要清醒认识自己的不足，会在消沉的时候，给自己说一些鼓劲的话，也会一再奉劝自己从容一点、平和一点，等待那个更安详的自己，去弥补这个有缺憾和纰漏的自己吧。

张昊月：《我愿埋首人间》一共12辑，从对故乡所在的黄土高原的抒写开始，中间吟唱乡间的植物、动物、农事、信仰等，最后以诗歌《一个人的阅兵式》收束。这样的编排有怎样的考量？

张二棍：从《黄土高原风成说》到《一个人的阅兵式》，是从苍茫大地的“因”到渺茫小我的“果”。在将近天命之时，我终于认清了一个现实，很多走过的路，会在梦中幻化成一条条绳索，捆绑着我回到脐血之地。在梦里，我仿佛从来没有长大过，更没有离开过。也许这恰好印证了“童年决定论”，也向我警示和提醒着，“你终归还是那个被农耕文明教化的孩子”。这几年，我陆续写了很多肉眼可见的日常生活、活色生香的市井见闻。我希望我永远瞩目于日新月异的现场，永远如一个专注的清洁工，执笔如帚，归拢着散落在街头巷尾的万千气象和点滴情谊。正如我在《一个人的阅兵式》中所写，那些松鼠先生、野猪

小姐、俯冲下来的鹰隼、心乱如麻的兔子、彻夜修改谎言的蟋蟀们、黎明前秘密集结的大雁们、火中取栗和水中捞月的猴子、街头卖艺的猴子……它们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异类，同时也是我文学意义上的分身或同胞。在写作时，我会把整座世界搬运到黄土高原的一个村落里，也会把万千生灵克隆到我这具单薄身体中。

张昊月：如您所说，山西代县的一个村庄是您观察世界的起点，您后来不断用诗歌与它对话。能否具体说说在您的诗歌创作中，“故乡”这个形象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张二棍：起初，母亲的怀抱是故乡，然后是村庄、一个县、一个省，甚至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随着行迹与意识的不断扩大，“故乡”这个词，也在不停叠加和衍生着。比如现在，也可以说文学是我的故乡。

### 寻找更清白、更可爱的自己

张昊月：《我愿埋首人间》主要收录了您的短诗，阅读时却觉得它们的容量很大，《旷野》《不一定》等诗，读完之后仍会感到回响不断。您的诗歌创作是兴之所至，还是有意识地有某方面的文艺追求？

张二棍：兴之所至，有。有意愿去追求什么，也有。正如“格物致知”与“物格无知”的并行不悖，正如一个人手舞足蹈是高兴，喜笑颜开也是高兴。诗歌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创作过程中的不可测与无定数。有时拈断数根须后豁然开朗，有时踌躇三五天仍大惑不解。所以，快马轻裘的“兴”与呕心沥血的“意识”，可能在所有人的写作中是更迭无序的。

张昊月：哪种状态会多一些？  
张二棍：我总觉得，一首几行十几行的诗，是苦苦思索之后的淋漓倾泻。或者说，诗歌是用风驰电掣的模样，托付一个写作者百转千回的情思。  
张昊月：在您看来，您的诗歌和您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二棍：也许，是主与仆的关系吧。而我，正是服侍诗歌的木讷的仆人。我带着怯懦、犹疑、恭敬，去尝试着接近每一行句子，我试图让一首在心头徘徊良久却影影绰绰的诗接纳我，我成为它

最忠实、最信赖的誊写者。

张昊月：这对关系与读者又构成什么关系？  
张二棍：作品即贡品，读者即王者。大家喝彩，我躬身致谢。大家批评，我扪心自问。

张昊月：您曾经有多年的地质工作的经历，也就是说，您曾常常处于时空的变动之中。这种经历对您早期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二棍：我早年的写作现场，是在雨夜或风中的帐篷里，在草中小憩或在树下遮阴的时候。彼时，我的写作依靠直觉审美，把身体的感受投放到自己的心里，再用文字呈现出来。所以，诗歌里处处充盈着动植物的形象，我努力想让它们在



2025年9月《我愿埋首人间》，张二棍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诗句中幻化成人形，并高于我们的人性，甚至我期待着用植物们的自在和坚毅、动物们的隐忍与安详，来医治我的卑怯、懦弱、自私、犹疑。而这几年，告别了二十多年的野外地质生活，整日游荡在人群与高楼之间，与山川草木的关系只是存在于梦境和记忆中。但我深知，山川草木在我生命中的烙印会伴随我一生。于是，我把人群当成另一个自然，另一个草木皆兵、风急雨骤的生命现场。这也许就是野外生活的意义吧，它让我学会了抱持一颗植物或动物之心，去凝视和打量我们的人间；也让我明白，一个写作者需要对自己进

内核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傅逸尘：关于“史诗性”概念，有多种权威辞典的标准阐释，但我比较看重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所反复强调的“伟大精神”。不是说，用长河小说的形式，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涉及众多的人物命运，就一定是史诗。为什么现在要重提“史诗性”？就是要重新定义、理解和认知以往的革命历史与当下的伟大现实。因此，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一定要在内容、形式与风格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精神的“史诗性”作品。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革命历史，理应有《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性”作品予以表呈，而且也应该产生那样伟大的作品。

### 新时代语境中的新叙事

记 者：从创作主体来看，“红色经典”作家大多是战争亲历者，写作源于切身生命经验与历史记忆；而“新红色经典”的创作者大多未亲历战争，依靠史料研读、田野考察与文学想象完成重述。这种“亲历式书写”到“非亲历式再叙事”的主体经验更迭，如何重塑新时代红色文学的历史观、真实观与叙事伦理？

傅逸尘：“红色经典”最值得称道的是生活细节的鲜活性与真实性，有着作者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真实体温。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生活细节的鲜活与真实并非小说唯一的标准。“亲历”当然是创作的优势，但是，当时很多作者将自己最精彩的生活写进第一部作品后，便再难超越。而当下“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一些作家在语言与技巧、观念与视野、思想深度与想象力等方面，都很有时代的优势，按理说应该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才对。然而，文学毕竟不是科学。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作家距离其所描写历史的远近，并没有决定性的关联。

记 者：有学者提出“红色叙事”普遍存在“潜结构”与“潜叙事”，隐秘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审美范式。对照这一论断，您认为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与“新红色经典”，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红色文学的“潜结构”，实现了叙事范式的现代性突围？

傅逸尘：承袭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叙事方法在“红色经典”作家中很普遍，这与写作者的文化构成以及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传统文学浸润有直接关系。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作家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甚至不乏硕士、博士，而且他们在年轻

时代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经历了“新历史主义”思潮，这对他们重新审视革命历史、进而用自己独特的思想方法和语言形式表现革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在书中梳理的七个方面也只是一个大体轮廓。我关注的作家作品在“审美现代性”方面是很突出的。在技术层面，“新红色经典”的创作主体较少使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正面”表达。

记 者：您特别关注到谍战、战争题材的创新，比如《千里江山图》的先锋语言、海飞谍战系列的民间烟火气。类型化创作与纯文学表达的融合，是不是“新红色经典”出圈的重要密码？

傅逸尘：类型化创作能否表现“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一题材本身多数都是写战争。至于谍战，如海飞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还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中，而且非常出彩。《千里江山图》有谍战的元素，但是否要归类到谍战小说还可以商榷。如果说它是先锋小说可能更接近作品本质，比如“新小说”式的隐蔽视角和“零度叙述”等特征非常明显。

记 者：“新红色经典”适配当下青年的共情点、共鸣点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用全新的历史叙事来完成红色血脉的赓续？

傅逸尘：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年轻一代受众是在高强度、高信息量的视听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反感说教，但并不拒绝深度；追求叙事速度和强感官刺激，但更渴求智性的挑战。也正因此，重现或还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似乎是当下青年读者的审美新需求。“新红色经典”创作越来越专业化、知识化的人物设定和形象塑造，不仅是一种叙事创新，更创造了一种可以和当下高度知识化的年轻受众同频、共情的身份认同。这方面确实需要今天的作家去大胆尝试和探索。

记 者：在您看来，推进关于“新红色经典”的分析和阐释，有着怎样的意义？

傅逸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历史，其厚重与丰富性、传奇与独特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已经上升到人类的精神史与文明史的高度，而中国文学对此的书写可以说远远不够。红色的“革命历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借鉴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与理论观念，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刻不容缓。这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表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对激励全国人民砥砺奋斗，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 观察揣摩周遭万物

张昊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有哪些？您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过挫折感？您又是如何面对的？

张二棍：我觉得我是个不太擅长读书的人，总是读了就忘，也缺乏那种庖丁解牛的阅读精神。这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写作，就如您说的，挫败与无力始终伴随着我。不过，我反倒觉得，也许正是挫败感的存在，才让我不断涌起写作的念头。

张昊月：去年《文艺报》邀请诗人与AI写同题诗，您受邀参与了这次活动。在您看来，AI时代，诗人如何更好地发出独特的声音？诗人如何既写出时代的特征，又能“唱着一支旧曲回来”？

张二棍：在一个诗人的言语世界里，一个人永远可以与自己互为敌人、互为至亲。我们注定要去感知的，是一个充满感性，甚至有些偶然的复杂世界，而不是一个被算法规定好的唯一正确的、充满绝对真理的世界。因此，一个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显得最“无知”、最懵懂。他们永远在向着那些理性的、世俗的眼光看起来“错误”的方向奔赴，并为人类保留那些貌似“无用”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心AI。

张昊月：您对自己未来诗歌创作的走向大致有什么样的思考？

张二棍：所有的写作，都随着人生轨迹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我几乎没有过切实可行的写作计划。但心里不时会对自己说：伏案写吧，莫管来路，莫问前程。

张昊月：对于诗歌探索路途中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创作体会？

张二棍：当我们试图去做一个诗人，就需要像藤蔓一样，找寻到一个缠绕和依附的所在。有人潜入记忆，有人驻足生活，有人瞭望远方，有人藏身典籍。就我自己而言，我把周遭的每件事物、每个陌生人，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来观察、来揣摩。甚至一个空荡荡的鸟巢，一张碎掉的报纸、一枚被咀嚼过的果核，我都猜测它们的前世今生与悲欢离合，赋予它们心跳、呼吸、血肉……当我这般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即便再平淡、再世俗、再简陋的生活，都充满新意。而新意，即我的诗意来源。



张二棍

行一次次的明察暗访，继而在纷纷扬扬的无数个自我中，我找到那个最清白、最可爱的自己。

张昊月：有的学者从生态角度评论您的部分诗歌，这是理解您的部分诗歌的一种视角吧？能否谈谈您对生态诗歌的理解？

张二棍：各花入各眼，可能有的学者是搞生态文学研究的，不经意间从我的作品里看到了什么，那是他人的学术诉求，我顺其自然就好。当然，我也希望写下的作品是多元的、多解的。我理解的生态诗歌，诗者也应当是使者，用更深切更热情的平等意识、同胞情怀，予山河以尊严，给生灵得庇佑。

我能够诉诸笔端的与纷呈生活相比，永远是挂一漏万的。但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携带着苍生的情状、黎民的念想，我也愿意把呼吸与心跳、欢颜或泪目，献给白纸黑字，让读到它们的人感知到一个写作者的本来面目。